

儿童视角下非洲后殖民文学中的叙事空间对比——以古尔纳《天堂》和阿迪契《半轮黄日》为例

兰超强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 本文通过比较古尔纳《天堂》与阿迪契《半轮黄日》中的儿童叙事策略, 表现非洲后殖民文学中儿童视角的独特性。研究聚焦儿童作为“未完全社会化”群体与被殖民者“他者化”境遇的结构同构性, 论证成人对儿童的规训互动, 本质上就是殖民权力关系的微观重演。儿童凭借未被驯化的感知力, 敏锐揭开殖民符号的暴力本质如优素福对“叔叔”到“老爷”称谓替换的沉默抵抗, 乌古在英语霸权中的身份挣扎, 均以直觉性质疑成人内化的权力逻辑。两部作品更通过动态成长视角突破后殖民研究的二元目的论, 优素福在债务奴役与空间迁徙中经历渐进式身份异化, 乌古则从创伤见证者蜕变为历史书写者, 二者螺旋形塑的身份轨迹解构了“压迫—觉醒”的线性预设。儿童视角由此成为解构殖民暴力微观机制的关键路径, 其身体感知的即时性、认知困惑的原真性与身份形塑的流动性, 将抽象殖民创伤转化为具象生命经验, 既挑战将殖民异化简化为道德评判的理论陷阱, 更以动态叙事守护被殖民者主体建构的开放性。

关键词: 儿童视角; 非洲文学; 殖民暴力; 身份异化

Comparison of Narrative Spaces in Africa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from a Child Perspective: Case Studies of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and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Lan Chaoqia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China Jiangsu Xuzhou 221000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child perspective in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and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It shows its unique value in Africa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a structural homology between children as unsocialized subjects and the otherized status of colonized peoples. Also, this homology turns the disciplinary interactions into a tiny replay of colonial power dynamics. We can know children's unsocialized perception acutely exposes the violence embedded in colonial signs. That is Yusuf's silent resistance to the enforced shift from "Uncle" to "Master", and also Ugwu's struggle within English linguistic hegemony. That is both instinctively deconstruct internalized power logics. What's more, the dynamic maturation perspective overpasses postcolonial studies' binary teleology. Yusuf's gradual alienation through debt bondage and spatial fragmentation. And it is compared with Ugwu's metamorphosis from trauma witness to historical chronicler, and also, their non-linear identity formation dismantles linear "oppression-awakening" paradigms. So, the child perspective gives as a vital tool for solving colonial violence's micro-mechanisms. The way we feel directly, the way cognitive genuinely, and the way identity keeps shifting. All of these turn abstract colonial trauma into something concrete, something you actually live through. In that, they push back against simplistic moral categories. And by telling the story in a dynamic, unfolding way, they keep the door open for a decolonial subjectivity.

Keywords: Child perspective;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Colonial violence; Identity alienation

0 引言

儿童看待世界与分析问题的角度是有区别于成人的。所谓儿童视角, 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 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

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的一种叙事方法^[1]。在后殖民作品创作中, 历史创伤与殖民解构一直是作家们书写的核心命题。儿童因为思维的不成熟, 在成人世界中往往会被成

人给约束和限制,掩盖自己内心的声音。^[2]因此,我们能发现在成人世界中天然属于边缘化的“他者”地位的儿童群体,出现在非洲后殖民文学作品中的频率也相当高。但是,正是这些视角,反而成为了非洲作家们揭露殖民暴力最锐利的武器。因为这种视角不仅是对“成人中心主义”叙事霸权的解构,更蕴含着对既定权力秩序的天然不解,这一不解可以让孩童尚未内化的“文明”规则使其能以“他者”眼光重新打量成人世界习以为常的符号体系,进而再重新或去或留地处理这些符号,使它成为自身认知与身份塑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

本文选取的是两位后殖民文学巨匠的典范文本: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的《天堂》^[4]与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的《半轮黄日》^[5]。古尔纳于202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1994年度作品《天堂》以19世纪末德属东非为历史舞台,塑造了被债务契约捆绑的少年优素福,他因家族负债被迫成为阿拉伯商人的流动奴役,在跨区域商队贸易中目睹殖民势力对非洲内陆空间的暴力重组,最终被编入德国殖民军队。而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的《半轮黄日》,则将叙事锚定在20世纪60年代尼日利亚。乡村少年乌古以佣工身份进入知识分子奥登尼博的宅邸,在主人的藏书室里接触到英语文学与反殖民理论,却在战争中被迫成为童兵。作为被殖民教育启蒙的底层青年,他既崇拜奥登尼博的智识权威,又在战争中目睹殖民遗留的种族仇恨如何演变为同胞相残。^[6]当他最终书写战争记忆,是对“语言霸权”这一殖民遗产的复杂继承。乌古的写作行为构成对“历史叙事权”的争夺,即在殖民者主导的所谓的“世界历史”与“文明史”叙事之外,他以童兵的视角填补了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底层创伤^[7]。

本文通过跨文本的类比与对照分析,深入分析《天堂》与《半轮黄日》中儿童视角如何建构多重叙事空间以揭示非洲后殖民文学中边缘化视角的独特认知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在物理空间层面,两部作品均以儿童的身体移动轨迹作为殖民暴力的空间索引。比如说呢,《天堂》中优素福随商队穿越的“德属东非”疆域被殖民者的军事据点,各种地理位置都被切割为碎片化的“权力飞地”,这就导致其身体成为丈量殖民地理的“活体标尺”。而《半轮黄日》里乌古从乡村宅邸到战场的空间迁移则映射出殖民遗产与内战暴力的地理重叠,学校、战壕等空间均成为殖民话语的再生产场所。二者的差异在于优素福的空间流动是被动的,这一被动是因经济压力也就是债务流放导致的,

其视野中的物与人始终笼罩着殖民者的命名暴力。但让我们再看乌古,则因有奥登尼博的熏陶,其的空间穿梭则带有主动的意味,他在奥登尼博的藏书室与他在战场上这两个空间之间的往返构成对文明与野蛮二元地理叙事的解构。因此儿童视角首先,它可以作为权力解构背后的有力叙事工具,儿童与成人的互动空间成为殖民关系的微型剧场。其次,它也是作为认知棱镜的陌生化力量,儿童未被殖民话语污染的感知系统,使其能以去熟悉化眼光解构成人世界的殖民符号。最后,它是作为创伤记录仪的非线性书写,儿童视角的动态成长背后蕴含的身份建构与认知策略变化恰是作者可以使用的批判优势。

1 权力镜像——殖民暴力在成人与儿童互动上的模拟

儿童被成人世界建构为需要规训、教化与定义的不完全主体,其经验与视角常被冠以“幼稚”“非理性”之名。同样地,殖民主义的核心操作正在于将被殖民者建构为他者,通过差异化标签,将殖民地人民剥离出“文明”主体的范畴,陷入可支配的客体地位^[8]。由此可见,儿童与成人权力运作逻辑与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他者化”形成跨时空呼应。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殖民者通过知识生产机制,将殖民地建构为“非理性”“野蛮”的镜像,从而为自身的“文明使命”提供合法性^[9]。《天堂》中哈利勒强迫优素福采用“老爷”称谓,既是对本土亲缘伦理的摧毁,也是殖民权力对“合理称谓”的单方面立法。所以可以说,儿童作为“未被完全社会化”的群体,其边缘性与被殖民者的“他者化”处境是形成同构的。也就是说,任何权力秩序的建立,都必须通过持续的符号暴力压制异质经验,而儿童与被殖民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压制的无声质疑。

在《天堂》中,哈利勒强迫优素福以“老爷”替代“叔叔”的暴力行为,就是殖民权力在哈利勒和优素福之间的殖民权力结构模拟。优素福对阿齐兹向来是以“叔叔”相称呼,但大家都知道“叔叔”这个词是承载着宗族伦理的,是有一定情感的。当哈利勒以狠揍来惩罚优素福对亲缘称谓“叔叔”的坚持时,暴力不仅制造生理疼痛,更斩断本土文化的情感根系。作为替代的是阶级化十分重的殖民符号“老爷”这一称谓。相比之下“老爷”这一称呼则蕴含着不折不扣的阶级化的殖民等级标签。因此,哈利勒和优素福之间的互动,正是对殖民暴力规训殖民地的一种模拟,这个模拟中可以看到既包含了身体上的规训,也包含了话语上的规训。优素福对这一规训的回答是沉默,这

种“留白”，我们能意识到，既是儿童对规训的本能抗拒，也隐喻被殖民者在霸权缝隙中守护主体性。

同样的，在《半轮黄日》中，乌古是殖民暴力模拟的承受者。奥兰娜和乌古用伊博语说话时，乌古却总会用英语来回答她的话，因为乌古认为奥兰娜说伊博语是在侮辱他，而说英语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知道，这一互动本质也是殖民关系的微型重演。乌古作为仆童，只能通过固守殖民语言反抗臆想的贬抑。因为出身底层，乌古十分敏感，因此他在用语言的方式做一种博弈。但这个博弈的逻辑最终还是陷到了英语霸权中，因此他仍没有摆脱殖民主义给他带来的摧残。儿童视角在此成为关键。这一视角的关键作用，在于捕捉这种心理博弈的未完成性。乌古觉得自己在反抗，可是却抛弃了自己的母语，使用英语来体现自身的文明性。同构的殖民关系上，即被殖民者表面是在抵抗殖民暴力，实际上是在强化殖民霸权逻辑。

2 陌生观察——儿童视角对殖民符号的敏感与揭露

儿童视角的叙事力量，根植于其未被完全社会化的认知特质。这种天然的陌生，正是使儿童能够剥离成人世界对殖民符号的麻木内化，以直觉性敏感刺破权力伪装的工具。比如说优素福对“老爷”这一称谓的不解与直觉性反感，一方面是殖民暴力的模拟，另一方面则是更深层次表明了作者用儿童的天真视角将那些被规训社会视为理所应当的等级符的重新问题化，这也就暴露其隐含的暴力本质。那我们从后殖民研究的理论维度看，这种叙事策略思考了传统研究对自觉反抗的过度强调，揭示被殖民者的抵抗还可以存在于日常感知的缝隙。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优势在于它将批判的基点从宏大历史叙事转向微小认知事件，这样做让殖民暴力的分析不再依赖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扎根于具体的生命经验。

例如，当优素福本能抗拒“叔叔”这一情感性符号被“老爷”这一阶级性符号取代时，作者使用儿童视角作为叙事方式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即儿童对语言情感价值的高度辨识力。这在儿童的眼中这是直观的情感纽带的暴力切割。他敏锐感知到“叔叔”承载的情感正被“老爷”的阶级不断吞并。优素福在被迫改口时感觉很不适，进而很抗拒。这一生理反应将抽象的符号替换转化为可感知的身体疼痛，这种从语言到身体的直接关联，暴露了殖民规训的本质，即它不是理性的文化交流，而是通过强制实现的后天可塑性改造。这种对语言情感价值的执着，其实是对“被殖民者主体完整性”的捍卫。

在阿迪契的笔下，当奥登尼博审视乌古写作的互动中，英语的工具性使用转化为权力展演。当主人，即奥登尼博，以英语点评并调侃元音缺失时，不禁做出了“忍不住想笑的表情”，这也正是流露出了殖民语言的內化优越感。在书中，乌古也明确立马就在心中感受到了自己的不适。奥登尼博选择用殖民语言来戏谑地进行文学评判与忍笑，与乌古对主人无意识傲慢的不满，刻画出所谓的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可是呢，作为接受殖民教育的知识精英，奥登尼博在反殖民话语与殖民文化习性之间的撕裂，通过儿童视角得以具象化。而其对乌古写作的英语评判，既包含对本土青年的智识培育期待，又无意识复刻了殖民者的语言霸权逻辑。这也就是作者想说的，儿童视角的批判力量正在于此。

3 动态形塑——成长视角下的身份异化轨迹

儿童视角的深层叙事价值，在于其动态追踪身份形塑过程的天然优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这一优势就在于它拒绝将殖民异简化为静态的创伤标签，又或者是被殖民者的某种觉醒符号，而是像纪录片一样呈现暴力如何通过日常逐步雕刻出被殖民者的状态和认知。这种带有过程性的书写，可以规避后殖民研究中常见的目的论陷阱。我们都知道往常思维模式往往预先设定了殖民创伤就会觉醒，觉醒了再接着反抗，反抗后就解放的固定逻辑条，又或者是从反方向来说，观察到被殖民者未达到预设的觉醒意识，于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仿佛所有被殖民个体或群体的经历都必须符合这一目的，而忽略了历史进程中真实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因此，儿童视角叙事的价值就在于此，即它用未被理论污染的感知方式，对抗研究中的概念先行。

在古尔纳的作品《天堂》中，优素福的身份形塑过程，正是殖民暴力微观渗透的悲剧性标本。他的成长是居于债务奴役的物化链条与各种规训的符号封禁之下的，并非线性地滑向彻底异化，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经历着身份的撕裂与重新认知。而优素福作为当地一份子，这一抵抗又在与自身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策略不断撕扯着，以维持自身生存需求。能看到，古尔纳逐步将个体研磨成权力结构的共生体，让儿童视角的优素福逐渐失去自身主体性，逐渐改变自身认知，既非完全驯化的奴隶，亦非振聋发聩的觉醒反抗者。

另外一边，乌古则在知识启蒙、暴力撕裂与叙事重建的螺旋上升中，完成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蜕变。乌古将自我价值嫁接于殖民教育体系，而之后的目睹恐怖战争又继续撕裂了这一认知，这就更撕裂了乌古可能仅存的对于文明

的建构与向往。我们能意识到,这一认知撕裂也催生了他对自己身份的理解和重构,于是最终乌古用笔记录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与优素福最终被经济压迫与殖民符号双重绞杀的结局不同,乌古跳出了作为他者被叙事历史的陷阱,选择用文字开辟出塑造自身身份的方法,这种带着创伤印记的持续重构,正是对殖民暴力试图将被殖民者定格静态他者的有力反驳。

4 结语

总之,在非洲后殖民文学研究中,儿童视角具有不可替代的认知价值。通过对《天堂》与《半轮黄日》的对比分析可见,该视角并非辅助性叙事手段,而是解构殖民暴力微观机制的重要路径。优素福对“叔叔”到“老爷”称谓暴力的沉默抵抗,乌古在英语霸权与母语认同间的身份挣扎,这都共同印证了儿童作为未完成主体的独特优势,使殖民创伤从抽象概念变为具体可证的生命经验。这种叙事策略的革命性,在于它打破了后殖民研究中常见的线性思维,拒绝为被殖民者的命运预设“觉醒”或“同化”的刻板化脸谱形象终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尔纳与阿迪契对儿童视角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后殖民文学的叙事角度,更在理论层面挑战了对被殖民者的认知惯性。当读者跟随乌古和优素福站在一个又一个人生转折点上时,非洲后殖民文学才可以超越非此即彼的道德制高点评判,从而落到对实际的、并非臆想之中作为符号的“人”的考察分析之中,否则将会从相反的角度重新陷入类似于欧洲中心论下曾经对于非洲大陆以及有色人种等各种非西方空间的脸谱化的刻板印象之中。因此,这种叙事实践提醒我们,真正的后殖民书写,既不是对“解放”的空洞许诺,也不是对“麻木”的百姓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惜批评,而是如儿童视角般保持对经验细节的敬畏,保持对存在个体的尊重。也就是说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本批评,承认并呈现这种复杂性本身,就是对历史真实的最大尊重,才能让理论从一维线条到二维旷野。

参考文献:

- [1] 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67-80.
- [2] 梁会莹.“儿童”与“傻子”视角下话语权的“失”与“得”探析[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2(34):80-81+85.
- [3] 郭淑颖.古尔纳小说《天堂》成长主题中的“他者之路”[J].晋中学院学报,2023,40(01):100-103.
- [4]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天堂[M].刘国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 [5] 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半轮黄日[M].石平萍,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3-6.
- [6] 何书英.阿迪契小说中的成长叙事研究[D].长江大学,2023.DOI:10.26981/d.cnki.gjhs.2023.000398.
- [7] 张勇.大历史,小叙事——阿迪契《半轮黄日》中的历史创伤叙事[J].当代外国文学,2019,40(03):76-85.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9.03.014.
- [8] 王黎君.儿童视角的叙事学意义[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02):49-54.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04.02.014.
- [9] Said E W. Orientalism[J]. The Georgia Review, 1977, 31(1): 162-206.

作者简介:兰超强(2002.04.02),男,汉族,安徽阜阳,硕士,中国矿业大学,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